

〔英〕金斯利·博尔顿 著
Kingsley Bolton
欧阳昱 译

中国式英语

一部社会语言学史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英〕金斯利·博尔顿 著

Kingsley Bolton

欧阳昱 译

中国式英语

一部社会语言学史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式英语:一部社会语言学史/(英)博尔顿著;欧阳昱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321-3977-4

I. ①中… II. ①博…②欧… III. ①英语-语言学史-中国

IV. ①H3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5663 号

CHINESE ENGLISHES by **KINGSLEY BOLTON**
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with the Syndicate of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08-450 号

责任编辑: 海力洪 曹晴

特约审读: 郭可

封面设计: 王志伟

中国式英语

——一部社会语言学史

(英)博尔顿 著

欧阳昱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75,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77-4/H·20 定价: 3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前 言

本书拟将有关香港和内地英语的描述和分析方面的历史、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资料搜集起来,加以论述。我的起点是我自己在社会语言学方面的学科背景,该领域被很宽泛地定义为“关于语言和社会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还有必要研究该课题的其他途径。因此,我试图广泛地,也希望合适地借助一系列其他学科,包括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

作为一个教育者和学术研究者,我亲眼目睹了殖民统治晚期决定香港未来的许多重大事件(尽管隔着不同的距离)。我之所以进行这项研究,部分动机是想解释这个地区与语言有关的许多问题,不仅是对我的学生,也是对我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加深了我与香港和内地这段语言史的契合。我希望本书浮现的一个重大主题是,英语在中国有着一段漫长但却几乎无人记录的历史,这段历史可以回溯到英国与广州、澳门海洋贸易的发端期。这次早期的接触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文化、政治和语言互动过程,反过来又与后期的发展衔接起来,如广州的鸦片贸易,19世纪“条约港口”^①中国的“半殖民主义”,清朝的覆灭和现代中国的发展。

我在本项研究中试图探索和接受的就是这段历史,与此同时,我将其定

① 一般译成通商口岸,但直译是“条约港口”,因为是签订不平等条约后产生的结果。——译注

位于更宽泛的亚洲多元英语语境之中。第一章试图对亚洲多元英语、“新多元英语”和世界多元英语的当前研究途径提供一个批评性的纵览,其中包括英语研究、语料库语言学、语言社会学、应用语言学、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研究、词典学和批评语言学等。我还要评估这类学科分支是否与关于香港和内地英语的讨论有关,其中部分原因是想为以下各章节的描述和分析廓清障碍。

第二章涉及香港英语和其他语言的社会语言学描述。该章关于语言问题的讨论立足于英国殖民最后十七年(即大致从1980年到香港回归的1997年)中的社会政治细节。该章的前半部分讨论这些年的香港社会政治史,描述一个移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亚洲魔幻经济的生成。它还叙说了个独一无二的香港身份故事,而这通过电影、电视、音乐和印刷媒体的世界性及混血文化反映出来。而最重要的是,这也许是一个关于持续如恒的社会变化和变化的故事。该章后半部分从历史及当代的视角谈及香港社会的语言背景,以便解释香港作为一个多语言社会的特殊动态结构。

第三章的研究和写作旨在理解中国南方英语“被人忘却”的部分(我后来是这么看的)。这反过来又让我参与了英语的“考古学”,我现在可以声称,这种研究方法在对世界多元英语史的调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本说来,这个方法的核心成分是历史性和文本性的:其历史意义在于,它要求对西方在华贸易和拓居的现存历史研究(以及所有能够弄到的第一手资料)进行检查;其文本意义则在于,许多源材料对语言的早期书写形式,有时是口头形式提供了具体例证。更具体地说,我研究的许多文本都是驶往中国的早期海洋贸易之旅,广州贸易的叙述,以及中国传教士和殖民官员的日记和其他内容。我还根据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材料制作了一大批内容为“皮钦语”和“中国海岸”英语的英美词汇表,不仅揭示了语言变化的过程,而且阐明了中国皮钦英语的话语内涵。除此之外,我还检索了同期一批中

国作者编撰的英语词汇表和英语字典,这反过来又成了与历史有关的社会语言学信息的无价资源。所有这些都帮助我发掘出中国南方的一部英语史,它始于17世纪早期,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继续使用“Canton jargon”(广州混合语),最后形成了目前的“香港英语”。

第四章回到当下,讨论当代香港英语的地位、功能和特征。该章纵观了得到承认的香港英语的社会语言学背景,并力主采用“范式转换”,为其开发更多创造可能性的论点。在讨论承认香港英语的必要标准之后,我还考虑了香港英语的意识形态问题和讨论语言问题时地方投诉传统的分量。该章后半部分讨论了这个语言变体在文学和非正式语境下的创造性。我认为,承认香港英语的理由不光是要承认语言的特征,而且要接受与香港英语相关话语的新空间或多重新空间。

最后一章,即第五章中,我力图把中国南方的英语史与全中国的英语史结合。我在该章纵览了中国从晚清到当前的英语教学情况。显而易见,中国从晚清的自强时期,民国的基督教会学校,1949年后的教育史,到时而让人出乎意料的当今,也都有其自身的英语史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向前推进,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进一步扩大贸易和世界的其他联系(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中国多元英语的可能未来还有更多值得一提之处。不过,那将是另一项研究的课题,这项课题要探讨的是中国和世界各地华人社会的世界最大两个语言的持续“界面”正在展开的当代故事。^①目前,能把过去发掘出来足矣,因为中英语言接触已有370年的历史了。

① 我很感激汤姆·麦克阿瑟教授,他于2000年3月在香港大学有关这个话题的一次讨论会上建议使用“中英界面”一词,来指涉中国语言和世界语言之间复杂的文化和语言互动现象。(麦克阿瑟2000)

鸣 谢

我欠的人情颇多,这些人通过与我讨论想法和交流信息,为我收集研究材料提供便利,帮我在利用档案资源方面指点迷津,或以其他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我,有的对本书各章节提出意见,有的以不同方式对我的研究给予帮助。下面这张名单肯定还不够完整,如有任何疏漏,无论是明显的还是出于其他原因的,谨此道歉。我要感谢英国的盖·库克、艾兰·戴维斯、柯林·丹克、罗伊·哈里斯、杰弗雷·亨德森、保罗·克斯韦尔、阿里斯泰尔·麦金托西、弗雷德里克·佩恩、马莎·彭宁顿、鲁迪·斯默特、彼得·特拉吉尔和罗伯特·J. C. 杨。特别要感谢汤姆·麦克阿瑟,他从一开始就鼓励我写这本书。我非常感谢瑞典的伽内尔·梅尔切斯和伽纳尔·帕森,自我在大学当教师以来一直对我的长期支持。同样,我很感激德国的埃德加·斯奈德近年来的同僚情谊和坚定支持。我谨向美国的布拉吉和亚姆纳·卡奇卢以及拉里·史密斯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无尽的好意,智慧的启发和比这还要多的一切。我要感谢澳大利亚的苏珊·巴特勒、詹姆斯·兰伯特、理查德·塔迪夫以及《麦夸里词典》编撰组的全体成员,谢谢他们的独特精神与为亚洲多元英语研究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我对爱玛·科特感激不尽,她通读了本书全稿并提出了许多有帮助的建议。我要感谢菲律宾的马·路德

斯·S. 鲍蒂斯塔、德拉萨大学的安德鲁·冈萨雷兹和亚洲发展银行的伊恩·吉尔。我要感谢中国澳门的那拉·巴勒陀、艾兰·巴克斯特、格伦·提摩曼斯和保罗·范·戴克；中国内地的殷企平和陈姝波，以及日本的安德鲁·穆迪。我在香港要感谢的人如此之多，其中包括香港大学曾经的学院同事，以及在该社会别处工作的其他人，包括鲍勃·亚当孙、约翰·培根-匈、菲尔·本森、詹姆斯·K. 秦(音)、苏珊娜·曹(音)、乔纳森·格兰特、约翰·E. 约瑟夫、苏西·科马拉(许素细)、韦尔玛·科马拉、林舜玲、贾基·林、佐伊·罗、赛德里克·李、格雷高里·李、莫里克·李、伊恩·罗(音)、陆镜光、克里·麦克费森、克利斯托弗·曼、凯希·南卡罗、欧文·南卡罗、杰拉尔德·纳尔逊、斯蒂芬·塞尔比、安东尼·斯威廷、戴维娜·涂(音)、Q·S. 童(音)、杰夫·韦德和密歇尔·吴(音)。我对林玉玲不胜感激，她给予了诸多咨询、意见，而且十分热心。还要诚挚地感谢我的同事克利斯托弗·哈顿和丹尼尔·R. 戴维斯，感谢他们通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意见。特别要感谢约翰和阿萨过去几年的支持和鼓励。

我还要感谢允许我复制版权材料，收入本书的单位。他们是 Tribal DDB 香港、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怡和有限公司、剑桥大学图书馆理事、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大英图书馆。

目 录

前言	1
鸣谢	1
第一章 新多元英语和世界多元英语：全球英语的多元中心之途	1
第二章 香港殖民后期英语的社会语言学：1980—1997	69
第三章 “中国多元英语”之考古学：1637—1949	147
第四章 香港英语作为一种“新英语”的崛起	243
第五章 香港英语、内地英语和中国多元英语	287
附录 香港英语词汇表	323
参考书目	337

第一章 新多元英语和世界多元英语： 全球英语的多元中心之途

英语不再专属英国人拥有,甚至也不再专属西方人拥有,而是一种国际语言,越来越多的人至少为了某种目的而接纳这个语言,不用因此而拒不承认……其自己语言的价值。

(哈利戴,麦金托希和斯特文斯,1964: 293)

英语语言帝国主义有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即英语的主宰地位是通过在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建立并持续重组结构性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来伸张和维持的。

(菲利普森,1992: 47)

英语的多中心化现象令人叹为观止,而且在语言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提出了关于多元化、语码化、身份、创造性、跨文化沟通性,以及权力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英语的普泛化和这个语言权力的到来是有代价的。对一些人来说,其影响令人痛苦,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种影响令人欣喜若狂。

(卡奇卢,1996: 135)

本章中,我希望把关于世界多元英语和“新”多元英语的研究与一系列相关学科挂起钩来——其中包括英语研究、英语语料库语言学,语言社会学、应用语言学、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研究、词典学和批评语言学。我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把我自己的研究定位在过去二十多年发展起来的世界多元英语调研传统中,一是调查一下,看世界多元英语的范式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澄清香港和内地的英语研究。

新多元英语

过去二十年中,“新多元英语”一词被用来指涉加勒比海地区、东西非和亚洲部分地区“地方化”的英语形式。本处有一个假定,即英语杂交形式的生发时间不过是过去的二十年,但事实上,欧洲语言和亚洲语言之间含有杂交的语言接触现象有着一段相对较长的历史,其漫长犹如欧洲在亚洲的贸易和殖民主义运动本身。在亚洲的“新英语”之前,“新葡萄牙语”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有清楚的文本证据表明,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亚洲多元英语”的起源至少要从17世纪算起。^①不过,为本章叙述起见,我想把这些问题

^①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和现代性等问题在欧洲列强(其中包括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和英国)与南北美洲、非洲和亚洲等殖民“他者”的遭遇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语言是这种种遭遇的核心,因为欧洲旅行者、贸易者、军队和殖民官员与这些“新”世界人民的接触要求“保持联络的语言”,所产生的后果几乎总是出人意料,而且直到今天都只被部分地理解,无论是在语言学史,还是在知识分子思想史方面,都是如此。然而,此处的中心问题是,把“新”这个词与“多元英语”连用是有问题的。还可以论证的是,英语本身也是一个较“新”的语言。首先,其历史据说与汉语相比,不过始于1500年之前,而许多学者称汉语有4000年的历史。其次,说它是一种新的语言,意思就是说创造其结构和形式的过程“有点像——但并不是——中世纪英格兰的克里奥耳化”,就像盎格鲁人遭遇古挪威人、法国人、拉丁人和希腊人一样。麦克阿瑟称这一过程为“杂交之浪”。(麦克阿瑟1998:175—6)

题暂时搁置起来,保留历史怀疑主义的态度。因此,我可以接受的是,1980年代早期,语言学的不同分支,包括英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等,都对“新多元英语”表现出比较突然的兴趣,因为它攫住了语言学者,甚至通过纸媒和电视上关于国际英语的大众化叙述而得到了英美一般公众认可。至少在学术界,要接受卡奇卢(1992)关于世界上英语研究的重大“范式转换”是在1980年代初发生这个论断,似乎还是很有理由的。

1980年以前,在英国、美国和有英语教学的许多其他社会里,主要的目标模式是单数意义上或者可能是“复型单数”意义上的“英语”。这包括英国的“标准英语”和美国的“一般美国式英语”。然而,1980年代产生了对全球英语形式进行甄别和描述的重大影响。这一重点转移主要基于对复数意义上“多元英语”的认识,对全世界英语因地理位置而产生“种类”的甄别和认识,将其看做是“国际多元英语”、“世界多元英语”或“新多元英语”。汤姆·麦克阿瑟(1992a)将“新多元英语”定义为“语言学上的一个词汇,指最近崛起并越来越具自主性,特别是在非西方环境下的一种英语,如印度、尼日利亚或新加坡。”(1992a: 688—9)^①

过去二十年中,出版了大量有关“新多元英语”的杂志文章,许多都发表在三种刊物上,《全球英语》(从1980年起,由曼弗雷德·戈拉奇主编);《世界多元英语》(从1981年起,布拉吉·卡奇卢和拉里·史密斯主编);以及《今日英语》(从1985年起,汤姆·麦克阿瑟主编)。在这种语境下,《世界多元英语》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卡奇卢和拉里·史密斯1985年接手主编之后,就把原刊名《世界英语》改成了《世界多元英语》。使用

^① “新英语”这个词汇的最早一个提法见于布拉吉·卡奇卢的一篇文章,题为《新多元英语,旧模式》,1977年发表。除了普莱德(1982)和普拉特等(1984)撰写的两本书外,“新多元英语”一词还见于卡奇卢(1980)撰写的另一章节,该章节在卡奇卢关于印度英语一书(1983)的一个章节中,以及麦克拉姆,克兰和麦克尼尔大众化描述性著作《英语的故事》(1986)的最后一章中。后来,在同一个十年中,出版了一本题为《新多元英语:新加坡的案例》的书。(佛里1988)

“多元英语”这个词来指称“各种不同的英语”也是近年才受欢迎的。例如,《MLA(现代语言协会)书目》在1980年前仅有一处提到“多元英语”,但1982至2002年间却有292处提及。同样,《LLBA(语言学和语言行为概要)索引》1980年前也仅有一处提到多元英语,但1982至2002年间却有985处提及。

“新(多元)英语”这个词使用率的迅速增长,理由之一是对英语“国际变体”给予了越来越大的认可。在亚洲地区,据说这些变体包括的英语“方言”有印度英语、马来西亚英语、菲律宾英语和新加坡英语。这些社会有一大批词汇进入使用领域:“作为国际(辅助)语言的英语”、“全球多元英语”、“国际多元英语”、“地方化的英语变体”、“新英语变体”、“非本土英语变体”、“二外英语变体”、“世界多元英语”和“新多元英语”。截至本书完稿时,最受欢迎的词汇是“世界英语”、“世界多元英语”、“全球英语”和“新多元英语”。

典型反映“世界英语”和“世界多元英语”之间差异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语汇的层面。苏珊·巴特勒作为词典编撰学家写作时曾宣称,英语在大部分语境下确立自己为“地方化”或“新”英语时,“会有两种主要力量在起作用……其一是外部的压力——美国英语横扫英语世界”。巴特勒认为这是世界英语的同义语,因为“这种力量提供的文字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于国际英语中,而且一般都通过媒体在全世界传播”。(巴特勒1997a: 107)巴特勒提到的第二种动能,也就是穿透世界多元英语而运作的那种动能则“纯粹是地方性的——它是地方文化的源泉,具有一种身份感”。(1997a: 109)于是,在词汇的层面,像 cable TV(有线电视), cyberpunk(赛博朋克), high five(高五[举手过头相互击掌])和 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确)这样的词目也许可以划为“世界英语”,而 bamboo snake(竹蛇), outstation(设在边远地区的分站), adobo(腌制)和 sari-sari store(莎丽-莎丽店)这类词目则可能在“世界多元英语”,说得更具体一点,也就是“亚洲多

元英语”中找到。

当卡奇卢和史密斯 1985 年接受编辑《世界语英语》一刊的工作时,该刊便易名为《世界多元英语》(其小标题为《作为国际语言和国内语言的英语学刊》)。他们对此的解释是,《世界多元英语》体现了“一个新思想,一种新信条”,复数的“多元英语”对此具有重大意义:

“多元英语”象征着语言功能和形式的变体,及其国际文化适应,如在西非、南非、东非、南亚、东南亚、西印度群岛、菲律宾,以及传统英语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那样。这个语言现在属于把它当做第一语言使用的人,也属于把它当做额外语言使用的人,无论是用其标准形式,还是用其地方化的形式。(卡奇卢和史密斯 1985: 210)

麦克阿瑟(1987)也谈到“世界标准英语”的核心,地方化的“多元英语”就是围绕这个核心而排列的。关于这两个词,可以形成这样一个简要的意见:“世界英语”一般是指这种在国际传播并为国际所了解的语言的理想化标准,越来越与美国纸媒和电媒相关联,而“世界多元英语”是指地方化的英语变体,在全世界“ESL”(作为二外的英语)社会使用,如尼日利亚、肯尼亚、印度、新加坡和菲律宾。然而,我们使用的许多例证都可能是指英语在单一层面或两个层面上的扩展。因此,我在本章讨论中将频繁使用“世界多元英语”这个词来涵盖两种意义下的各个变体。

“全球英语”这个词目前可大致看做是“世界英语”的同义语。“新多元英语”一词则在宽泛的意义上类同于‘世界多元英语’。不过,它们之间的侧重面还是不同的,正如下面关于该词起源和使用的讨论所暗示的那样。麦克阿瑟(1992b)注意到,普莱德(1982)是把新多元英语作为书

籍标题的第一人。该书共含 15 篇关于非洲和亚洲英语的文章,其中包括喀麦隆、尼日利亚、印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所涵盖的论题有对非洲和亚洲英语的社会语言学描述,双语主义和双文化主义,语言教育和英语“新变体”或“本土化变体”的分类和描述。然而,“新多元英语”一词只是附带处理了一下,尽管其被选为该书标题。普莱德对该书的引言题为《新多元英语的魅惑力》,并未对该词本身下一个定义,却讨论了一大堆与该卷内容相关的问题,其中包括“语言帝国主义”、前英语殖民地英语的“中立性”,以及这类语境下关于“综合化”相对于“工具化”的动机的讨论。(普莱德 1982: 1—7)该卷中理查兹的一篇文章也很有意义,即《英语新变体的修辞和交流方式》,它讨论了新多元英语的崛起和重要性:

英语新变体有不同的描述,有的叫英语的“原住民”变体,有的叫“本土化”变体,有的则叫“地方”变体……这些变体目前都在伸张其社会语言的合法性……英语新变体崛起速度之快,如此产生的英语新码之独特,对类型学和语言变化都提出了很有意思的问题,要求给予合适的理论模型和解释。(理查兹 1982: 227)

普拉特、韦伯和侯(1984)合写的《新多元英语》一书对有关亚洲,包括印度、新加坡和菲律宾,以及西非,尤其是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多元英语做了一个总览。这几位作者建议用一系列标准来判定一种新英语,其中包括:

- 其在教育制度(特别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育制度)中的使用。
- 其在英语“本土变体”不是主体语言地区的发展。
- 其在某一国家或社会一系列功能中的使用。